

【『扬州八怪』中的南通人】
LI FANG YING

李方膺

张松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扬州八怪】中的南通人

LI FANG YING

李方膺

张松林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方膺 / 张松林著.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7.6

(江海文化丛书 / 姜光斗主编)

ISBN 978-7-5672-1960-1

I. ①李… II. ①张… III. ①李方膺 (1695-1755)
-传记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03742号

书 名	李方膺
著 者	张松林
责任编辑	董 炎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十梓街1号 215006)
印 刷	南通超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
字 数	201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1960-1
定 价	26.00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江海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季金虎

委 员：李明勋 姜光斗 李 炎 施景铃
沈启鹏 周建忠 徐仁祥 黄振平
顾 华 陈 亮 吴声和 陈冬梅
黄鹤群 尤世玮 王建明 陈鸿庆
沈玉成

主 编：姜光斗

执行副主编：尤世玮 沈玉成

“江海文化丛书”总序

李 炎

由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编纂的“江海文化丛书”(以下简称“丛书”),从2007年启动,2010年开始分批出版,兀兀穷年,终有所获。思前想后,感慨良多。

我想,作为公开出版物,这套“丛书”面向的不仅是南通的读者,必然还会有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读者。因此,简要地介绍南通市及江海文化的情况,显得十分必要,这样便于了解南通的市情及其江海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同时,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选题原则和编写体例,一定也是广大读者所关心的,因此,介绍有关背景情况,将有助于阅读和使用这套“丛书”。

南通市位于江苏省中东部,濒江(长江)临海(黄海),三面环水,形同半岛;背靠苏北腹地,隔江与上海、苏州相望。南通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及人文特点,被列为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之一。

南通市所处的这块冲积平原,是由于泥沙的沉积和潮汐的推动而由西北向东南逐步形成的,俗称江海平原,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境内的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新石器文化遗址告诉我们,距今5600年左右,就有先民在此生息



繁衍；而境内启东市的成陆历史仅300多年，设县治不过80余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里有沧海桑田的变化，有八方移民的杂处；有四季分明、雨水充沛的“天时”，有产盐、植棉的“地利”，更有一代代先民和谐共存、自强不息的“人和”。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里成为我国实现早期现代化的重要城市。晚清状元张謇办实业、办教育、办慈善，以先进的理念规划、建设、经营城市，南通走出了一条与我国近代商埠城市和曾被列强所占据的城市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南通于五代后周显德五年（958）筑城设州治，名通州。北宋时一度（1023—1033）改称崇州，又称崇川。辛亥革命后废州立县，称南通县。1949年2月，改县为市，市、县分治。1983年，南通地区与南通市合并，实行市管县新体制至今。目前，南通市下辖海安、如东二县，如皋、海门、启东三市，崇川、港闸、通州三区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占地800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770万，流动人口约100万。据国家权威部门统计，南通目前的总体实力在全国大中城市（不含台、港、澳地区）中排第26位，在全国地级市中排第8位。多年来，由于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及全市人民的努力，南通获得了“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综合治理先进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并有“纺织之乡”、“建筑之乡”、“教育之乡”、“体育之乡”、“长寿之乡”、“文博之乡”等美誉。

江海文化是南通市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上下五千年，南北交融，东西结合，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深邃的人文精神。同其他地域文化一样，江海文化的形成，不外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结构。但她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尽相同之处是：由于南通地区的成陆经过漫长的岁月和不同阶段，因此移民的构成呈现多元性和长期性；客观上

又反映了文化来源的多样性以及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因而使得江海文化成为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变”与“不变”的复合体。“变”的表征是时间的流逝，“不变”的表征是空间的凝固；“变”是组成江海文化的各种文化“基因”融合后的发展，“不变”是原有文化“基因”的长期共存和特立独行。对这些特征，这些传统，需要全面认识，因势利导，也需要充分研究和择优继承，从而系统科学地架构起这一地域文化的体系。

正因为江海文化依存于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蕴含着自身的历史人文内涵，因而她总会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出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即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历史文化人物、历史文化事件、历史文化遗址、历史文化艺术等，又是这四类中常见的例证。譬如，我们说南通历代人文荟萃、名贤辈出，可以随口道出骆宾王、范仲淹、王安石、文天祥、郑板桥等历代名人在南通留下的不朽篇章和轶闻逸事；可以随即数出三国名臣吕岱，宋代大儒胡瑗，明代名医陈实功、文学大家冒襄、戏剧泰斗李渔、曲艺祖师柳敬亭，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等南通先贤的生平业绩；进入近代，大家对张謇、范伯子、白雅雨、韩紫石等一大批南通优秀儿女更是耳熟能详；至于说现当代的南通籍革命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及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也是不胜枚举。在他们身上，都承载着江海文化的优秀传统和人文精神。同样，历史文化的其他类型也都是认识南通和江海文化的亮点与切入点。

本着“文化为现实服务，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个长久的现实，因此不能急功近利”的原则，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成立之初，就将“丛书”的编纂作为自身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们试图通过对江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将其中一部分

能反映江海文化特征，反映其优秀传统文化及人文精神的内容和成果，系统整理、编纂出版“江海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将为南通市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为将南通建成文化大市和强市夯实基础，同时也为“让南通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南通”做出贡献。

“丛书”的编纂正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逐步展开。

纵向——即将不同时代南通江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遗址（迹）、重大事件、重要团体、重要人物、重要成果经过精选，确定选题，每一种写一方面具体内容，编纂成册；

横向——即从江海文化中提取物质文化或非物质文化的精华，如“地理变迁”、“自然风貌”、“特色物产”、“历代移民”、“民俗风情”、“方言俚语”、“文物名胜”、“民居建筑”、“文学艺术”等，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每一种写一方面的内容，形成系列。

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的体例结构基本统一，行文风格大体一致，每册字数基本相当，做到图文并茂，兼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先拿出一个框架设想，通过广泛征求意见，确定选题，再通过自我推荐或选题招标，明确作者和写作要求，不刻意强调总体同时完成，而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经过若干年努力，基本完成“丛书”的编纂出版计划。有条件时，还可不断补充新的选题。在此基础上，最终完成《南通江海文化通史》《南通江海文化学》等系列著作。

通过编纂“丛书”，我有四点较深的体会：

一是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基础。我们从这套“丛书”，看到了每一单项内容研究的最新成果，作者都是具有学术素养的资料收集者和研究者；以学术成果支撑“丛书”的编纂，增强了它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二是关键在广大会员的参与。选题的确定，不能光靠研究会领导，发动会员广泛参与、双向互动至关重要。这样不



仅能体现选题的多样性，而且由于作者大多出自会员，他们最清楚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写作能力，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及成书的效率。

三是离不开各个方面的支持。这包括出版经费的筹措和出版机构的运作。由于事先我们主动向上级领导汇报，向有关部门宣传，使出版“丛书”的重要性及迫切性得到认可，基本经费得到保证；与此同时，“丛书”的出版得到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支持，出版社从领导到编辑，高度重视和大力配合；印刷单位全力以赴，不厌其烦。这大大提高了出版的质量，缩短了出版周期。在此，由衷地向他们表示谢意和敬意！

四是有利于提升研究会的水平。正如有的同志所说，编纂出版“丛书”，虽然有难度，很辛苦，但我们这代人不去做，再过10年、20年，就更没有人去做，就更难做了。我们活在上，总要做些虽然难但应该做的事，总要为后人留下些有益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我深信研究会定能不辱使命，把“丛书”的编纂以及其他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研究会的同仁嘱我在“丛书”出版之际写几句话。有感而发，写了以上想法，作为序言。

2010年9月

（作者系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会长，“江海文化丛书”编委会主任）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腹有诗书气自华	7
第二章 不尽春光在眼前	21
第三章 初入仕途“谈笑轻王侯”	28
第四章 从今不薄风尘吏	43
第五章 画家门户终须立	73
第六章 收拾春光又重来	100
第七章 转从三黜任逍遥	120
第八章 独以诗画荐轩辕	147
尾 声	172
附一：李方膺大事简表	177
附二：管劲丞：《李方膺史料杂考六题》选二	183
附三：李方膺梅花楼诗抄、题画诗文及语录	186
后 记	
——李方膺作品中的信息	231
主要参考书目	240

引言

本书主人公李方膺(1697—1756),字仲弘,号晴江、抑园、嘯尊者、衣白山人等,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画家,“扬州八怪”之一。

清康乾时期,中国画坛上出现的扬州画派,历史上一概称作“扬州八怪”。这个画派之所以被目为“怪”,是因为他们与当时被皇家推崇的传统画派大异其趣。他们反对循规蹈矩、陈陈相因的画风,而主张以俗为美,以新鲜生动为美。“野性从来不剪裁”(顾于观语)、“偃蹇龙驹不受羁”(汪士慎语),可以说他们是一个在艺术上纵横捭阖、不拘古法,敢于离经叛道的画家群。“八怪”是个带有幽默诙谐意味的贬称,江淮一带民间口语里有“丑八怪”“八脚怪”的名称,是指不合时宜而为另类的意思,同时怪又有丑的意思。其实,美与丑,在不同社会、不同阶层,标准不一,看法不一。所谓怪者,奇之义也。所谓奇者,新之义也。八怪、八怪,实际就是洗涤



李方膺自书：梅花楼主人李方膺

窠穴、传新布奇的创新画派。这是明代以来社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给文人画带来的进步思潮，绘画不再仅仅是上层人物的玩品，它从统治阶级的神秘殿堂解放出来，走向民间；由士大夫华府走向商人厅堂，走向酒楼歌场。它可以抒发作者心中不平，可以代民立言，可以为商品，走向市场。

这个画派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期的扬州？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扬州自古就为两淮盐商集散地。盐业税利在封建社会是国家的重要财政收入之一。唐宋时期“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元代“计每岁天下盐利，当租赋三分之一”。到了清代康乾时期，仍然是国家赋税大户。两淮盐场不仅产量特大而且质量上佳。李白就有“吴盐如花皎白雪，持盐把酒但饮之”的赞美诗句。吴盐下酒，李方膺也有这样的吟咏：“沽来美酒三杯醉，萝卜青盐大蒜头。”扬州繁荣，“藏富于民”，“淮海维扬下下田，兹看扑地聚人烟”（清高宗弘历句）。盐商、徽商富了，光《三字经》《论语》已经无法满足他们了，还要有文化装点门面，还要有点字画、古玩什么的，这就必然会刺激艺术品的生产。其二，石涛从康熙十九年（1680）到扬州落脚，直到康熙四十六年去世，在扬州创作了他平生一半以上的美术作品，对扬州画派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不仅以个人的别开生面的绘画作品和《画语录》那样充满生趣的绘画理念，带来了艺术上的新鲜空气，而且还带来了青藤、八大的影响。其三，地方官“与时俱进”的开通，特别像卢雅雨那样的地方大员不仅不反对“突破”传统的绘画风格，而且还和这批画家关系很亲密，经常聚会，这样必然起到宣传、推介的作用。其四，虽然清王朝搞文字狱越演越烈，不仅文人的诗文要查，而且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05）还下令各省郡邑审查、“铲削”“志书”，次年又进一步株连到民间歌谣、戏剧曲本、小说稗史，都要过堂审查。可是基本没



有审查到绘画。古代的统治阶级一向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维护政教伦理的工具。而绘画除宋徽宗赵佶几个皇帝之外，大多认为是雕虫小技，为文人的笔墨之余。如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都是爱画会画的，乾隆帝高兴起来还执刀刻印章、学东坡用朱砂画竹。康熙帝在为《御制佩文斋书画谱》作的序中，也只指出书画的作用是“用以摅适性情，泳陶清暇”。如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查办的一柱楼诗案，牵连到许多读书人和许多没有重视此案的官员。徐述夔的诗文集彻底被销毁，民间也荡然无存，难觅一页半纸。而他题在30多幅画上的菊花诗却幸免于难，留存了下来。可见那个时代当个纯画家还是相对自由和安全的。其五，外地画家如浙江金冬心、福建黄慎、安徽汪士慎、李啸村等来扬州卖画，发现“扬俗轻佻，喜新尚奇”，或作了长期逗留，或干脆定居下来，他们和本地画家会合，遂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新潮画家群。以上诸因素综合存在于扬州，天时、地利、人和齐全。否则，扬州八怪画家群也很难出现在扬州的。试想，为什么不出现在天堂苏杭，不出现在南昌、建康或者安徽等地呢？皆因这些地方缺乏综合因素的氛围。

这个画派的活动时期，有学者（如薛锋、黄倬成教授）提出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华岳出生算起，（也有学者如丁家桐先生认为当从石涛到扬州算起，则提前2年。又如周积寅、王凤珠两位教授则提出从当今发现最早的华岳传世作品创作年代康熙四十二年算起，则推迟22年）到清嘉庆四年（1799）罗聘逝世止，历时118年。这中间被列入八怪之林的画家有十多位。这些画家不是常住扬州就是到扬州卖过画，而李方膺只有几次“路过”扬州，却也被列入八怪之林，这是因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方膺出生在南通州，通州是隶属于扬州府的。直到雍正二年（1724）南通州才改为直

隶州。加之李方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入学时便是扬州府的名额，他是扬州府的秀才。他在雍正二年画的《拳石水仙图》上还盖有“维扬李氏”的印章。同时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人品、画品和郑板桥、李复堂等相近。虽然他们个性各异，绘画风格也各自有面目，但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不是白首功名无分，就是被诬陷落职；他们有着共同的雅俗观和审美情趣，以为笔墨迎合上层，“供人玩好”为俗，“以慰天下劳人”“歌咏百姓之勤苦”为雅（郑燮语）。因而被后人列入八怪之林。



小字龙角



维扬李氏



淮南布衣



德成于忍



受孔子戒

有人称扬州八怪中的郑板桥是班头，金冬心是佛，李鱣是仙，李方膺是金刚。也有人把李鱣和李方膺合称为“二李”，或称为“大仙李”“小仙李”。李方膺就有一枚“仙李”二字的印章，还有一枚“小李”二字的印章。当代学者丁家

桐先生又这样概括：“八怪诸人中有三县令（按，都是出生于扬州府的），这就是李蟠、郑板桥、李方膺。三县令其实属三派，李复堂是浪漫派，郑板桥是难得糊涂派，李方膺则是笑傲轻王侯派。”李方膺则在画上自称是淮南布衣、江左陋儒、梅花和尚、啸尊者、木头老子、桑苎翁、仆本恨人、衣白山人……他在题画诗上还说“成得狂夫便是吾”。他自呼为“狂夫”。

李方膺究竟是何许人也？李方膺的好友袁枚这样描写他的清狂形象，“彼颀而长，眼三角芒者”，这是说他个儿高且清瘦，三角眼，目光闪闪，亮如火星。又描写他穿衣：“山人着衣好着白，衣裳也学梅花样。”又描绘他的举止：“偶遇不平鸣，手作磨刀冰。”丁有煜用了三个“最”字来概括他：

“性最敏、眼最慧，而气最盛。”据记载，他还有点秃顶，“性通脱不羁，又嫉俗，善谩骂人，不避权要”。要是在酒席上触动了心中块垒，他往往“金刚怒目来献嘲”。清代通州州官这样说他，“性喜歌舞，岸然露圭角，其郁勃不平之气一寄于书画，松竹兰菊皆精，而尤长于梅竹，大幅三四丈，蟠塞夭矫，或谓为自家写生，但微笑而已”。关于他的艺术成就，在以后章节中还要分时期作介绍，这里就不细说了。说他喜歌舞，可能因他爱好音乐善歌舞而言，这主要见于他解官后寓居金陵借园后的作品中。不过，李方膺致仕后穿一身白衣，洁白如冲风傲雪的梅花，兴来对梅写照，酒酣梅下吹笛，确是一个真情外露、脾气古怪的倔强老头。与其说他性格如烈火金刚，倒不如说他的画境



李方膺诗一首

如金刚烈火。他借画抒怀，借题诗泄愤寄慨，倾吐心声，要比其他几位八怪来得更加深沉郁勃，更加张扬外露。



李方膺画像 沈启鹏绘

第一章 腹有诗书气自华

一、官二代的家世

李方膺是凭官二代的身份做了官的。在扬州八怪画家群里，虽然不少人出身书香官宦之家，可是父亲是当官的，仅有李方膺。李鱣的祖上很阔，上追第三世祖是南宋宰相李纲，第十九世祖是明嘉靖朝的宰相李春芳，可是到了二十三世李鱣的祖父李法虽然富有田产，却因改朝换代的变故没有应考，没有功名。到了其父李朱衣更未能读书。郑板桥的祖父郑湜、父亲郑立庵都是读书人，但也没有博得功名。独有李方膺的父亲李玉铉做到了正三品的大员，虽然不在中央，但在省里分管臬司，到底可算“高干”了。

李方膺的祖上并不显赫。当李鱣说李纲是自己的先祖时，也有人恭维说李方膺的先祖是李泌。李泌是唐代中期的名相，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封邕县侯，世称邕侯。李方膺高兴起来也曾戏称自己是“相门才子”。不过这些都无从考证。能考证到的李方膺的南通始祖是李元佩，据说是在明代朱元璋刚打败张士诚的时候，由江西新淦县迁来通州的。朱洪武把张士诚的部下和江南支持过张的大户人家，全部赶到今日苏北海边，罚他们当盐工。李元